



世纪文库

中国古代哲学史

胡适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古代哲学史

胡适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8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5325-7327-1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古代哲学—哲学史—中国 IV. ①B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9227 号

责任编辑 毛承慈

装帧设计 何 旸

中国古代哲学史

胡 适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4

字 数 247,000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327-1/B·872

定 价 32.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中国古代哲学史

出版说明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编辑《新青年》，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张自由主义。1938年任驻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7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在台湾病逝。

《中国古代哲学史》原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本是胡适1917年9月以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课程的讲稿，曾作为讲义油印发给学生。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30年收入“万有文库”，书名改作《中国古代哲学史》。195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改版重印，胡适新增《〈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一篇，并在书后做一个“正误表”，订正原版讹误。

《中国古代哲学史》是第一部借鉴西洋哲学方法写作的中国哲学史。在书中，胡适首先界定了哲学和哲学史的确切含义，严格限定了哲学史史料的范围，提出了一整套哲学史史料学的基本规范，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同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梁启超就曾作过《评胡适之〈中国哲

学史大纲》的讲演，即主要批评此书的缺点。胡适在《台北版自记》中也提到了此书的缺点，如用《列子》里的《杨朱篇》来代表杨朱的思想，讲“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最脆弱的一章等等。

本次出版，据台北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改排，竖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其后的“正误表”补入正文之内，特此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

序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

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 and 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再版自序

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会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于意料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

这部书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时，我自己的见解已有几处和这书不同了。近来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讨论这部书的内容，有几点我很佩服。我本想把这几处修正了然后再版。但是这时候各处需要这书的人很多，我又一时分不出功夫来做修正的事，所以只好暂时先把原版重印。这是我很抱歉的事。（有一两处已在正误表中改正。又关王墨辩的一部分，我很希望读者能参看《北京大学月刊》第三期里我的《〈墨子·小取〉篇新诂》一篇。）

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逈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书排印校稿的时候，我正奔丧回家去了，多亏得高一涵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替我校对，我很感谢他们。

民国八年五月三日 胡适

《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

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民国七年九月写成付印，民国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国四十七年，这部书出版以来，整整三十九年了。台北商务印书馆现在用“万有文库”的五号字本《中国古代哲学史》重印，仍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名称。我做了一个正误表，附在卷尾。^{〔1〕}

“万有文库”本是民国十八年用五号字重排的（原书是用四号字排的）。那时候，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所以当时“万有文库”的编辑人要把我的哲学史上卷收在那部丛书里，我就提议，把这个五号字重排本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不预备修改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了。

我现在翻开我四十年前写成的这本书，当然可以看出许多缺点。我可以举出几组例子：（一）我当时还相信孔子做出“删诗书，订礼乐”的工作，这大概是错的。我在正误表里，已把这一类的话都删去了。（二）我当时用《列子》里的《杨朱》篇来代表杨朱的思想，这也是错

〔1〕 编按：已据“正误表”订正有关文字，今删。

的。《列子》是一部东晋时人伪造的书，其中如《说符篇》好像摘抄了一些先秦的语句，但《杨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请读者看看我的《读吕氏春秋》（收在《胡适文存》三集）。我觉得《吕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贵生》、《情欲》诸篇很可以表现中国古代产生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杨朱》篇了。《吕氏春秋·不二》篇说“杨生贵己”，李善注《文选》引作“杨朱贵己”。我现在相信《吕氏春秋》的“贵生”、“重己”的理论很可能就是杨朱一派的“贵己”主义。（三）此书第九篇第一章论《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节述“《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也曾引用《列子》伪书，更是违背了我在第一篇里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的原则。我在那一章里述“《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大有问题。例如《庄子·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是谓天均。

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环，莫知其伦”八个字，这里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论罢了。我在当时竟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现在让台北商务印书馆把我这本四十年前的旧书重印出来，这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他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也许还可以补充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几部中国哲学史的看法。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

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我在第八篇里曾说：

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

这个看法，我认为根本不错。试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陆、王的争论，岂不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岂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学方法的争论吗？南宋的朱陆之争，当时已认作“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条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个方法上的争执。两宋以来，“格物”两个字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其实多数也还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承认司马谈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办法。我不承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称。我这本书里从没有用“道家”二字，因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书里从没有见过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称，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谓法家”的标题，在那一章里我明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至于刘向、刘歆父子分的“九流”，我当然更不承认了。

这样推翻“六家”、“九流”的旧说，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个目标。我的成绩也许没有做到我的期望，但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

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

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是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们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的。他们讲中国哲学思想，要从孔子讲起。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冯先生的书里，先讲了孔子、墨子、孟子、杨朱、陈仲子、许行、告子、尹文、宋轻、彭蒙、田骈、慎到、驺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

冯先生说：

《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原注：参看崔东壁《洙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人之作品。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民国三十六年增订八版，页二一〇）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

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挪移到战国后期去（留心这个问题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评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录。这些文字收在《胡适论学近著》，页一〇三以下；即台北版《胡适文存四集》，页一〇四以下）。

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多吃了几担米，长了一点经验。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试看冯友兰先生如何说法：

……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由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页二九）

懂得了“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的长文讨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费心思，白费精力了。

1958年1月10日 在纽约寓楼